

# 高阳纺织业百年历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价值

袁为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高阳纺织业具有跨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上百年发展历程,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专门研究高阳纺织业的著作和学位论文就有五六部之多,其中冯小红新著《高阳纺织业发展百年历程与乡村社会变迁》一书最为详尽和精深。在方法论意义上,冯著开创了一种聚焦于单一产业、中观产业集聚区、长时段变迁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可为日后研究同类区域提供借鉴。在经济史理论方面,首先,高阳纺织业百年来的周期性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其经验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契合。其次,与吴承明先生提出的“南通模式”相比较,“高阳模式”是以工业前联和商业后联的方式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了域内经济的开放性,形成一种更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乡土经济发展路线。再次,在高阳纺织业现代化的变革主旋律之外,也有对传统工商业管理制度中精华部分的发展性继承。总之,高阳纺织业百年历程研究所涉及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均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究。

**关键词:**方法论;经济史理论;高阳纺织业

**中图分类号:**F129;K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20)03-0173-05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棉纺织业是一个被学界关注较早和较多的领域。同时,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研究中,乡村工业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高阳纺织业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无论在中国近代纺织业研究中,还是在近代乡村工业化的研究中都备受青睐。仅以高阳纺织业为中心的研究来说,近年来就涌现出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赵玮、李进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赵志龙的《高阳纺织业的变迁(1880—2005)——对家庭工业的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李小东的《高阳商会与近代高阳织布业研究(1906—1933)》(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冯小红的《高阳纺织业发展百年历程与乡村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成果。在上述成果中,冯小红的新著《高阳纺织业发展百年历程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下简称《百年历程》)是一部资料最为翔实、研究时段最长的著作,该书运

用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高阳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田野调查资料、日记等多种类型的史料,深入剖析了1908年至2008年高阳纺织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以及高阳纺织区的乡村社会变迁,并以高阳纺织区为中心,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工业的地位和发展前途等理论问题。在这里,本文仅就该书体现出的方法论意义作一个简单总结,并就内化于该书叙述之中却未曾阐明的理论价值作进一步阐释。

—

中国历史研究一般依据断代史划分研究领域,如明清史、近代史、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治史的学人也大都按照各自的研究领域分别做各断代史范畴内的论题,较少有人突破断代界限,做跨越几个断代的长时段研究。《百年历程》一书选择1908年至2008年间的100年作为研究时段,跨越了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断代,构建了一个跨越几个断代的长时段研究。诚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也有一些长时段研究成果,与这些成果相比,《百年历程》

**作者简介:**袁为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一书有两个特色:

其一,在研究区域方面,以往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长时段研究成果或选择较大的地域,可称之为宏观区域,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探讨的区域是整个华北农村,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探讨的区域是“江南”地区<sup>①</sup>;或选择较小的地域,甚至集中于某个村庄,可称之为微观区域,如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考察的区域是位于长江下游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的秦村,张思《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考察的区域是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村。而《百年历程》研究的则是以一个县域为中心、包含周边其他四个县域部分地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地域,可称之为中观区域。

其二,在研究内容方面,以往有关乡村社会的长时段研究大多选择乡村经济和社会的一般状况开展全方位研究,如上文所举李伯重的著作,涉及纺织、食品、服装、日用百货、烟草、造纸与印刷、工具制造、建材、造船等几乎所有手工行业。张思的著作也涉及农村的政治进程、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农业、副业、收入分配、人口、对外交往、社会保障、社会优抚与救助、医疗卫生、教育、女性等诸多内容。而《百年历程》一书研究的是高阳纺织业的长时段演变和高阳纺织区的长时段社会变迁,即乡村单一产业的长时段演变和单一产业聚集区的长时段社会变迁。

除以上两个特色外,《百年历程》在研究时段上也有其特殊性,1908年至2008年的时段能够完整地展现中国乡村工业的现代化历程。诚如《百年历程》所总结的,高阳纺织业是一个研究乡村工业现代化历程极为难得的典型个案。中国乡村工业的现代化发端于清末,中经民国初年的初兴、战争环境下的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复兴和集体化时代的反复、改革开放后的复兴和快速发展,最终在21世纪初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和工业化,完成了现代化。<sup>②</sup>高阳纺织业恰恰在一个行业上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乡村工业的现代化历程。

总之,《百年历程》一书以高阳纺织业和高阳纺织区为中心,深入细致地探究了一个乡村单一产业的长时段经济现代化历程和一个以单一产业为主的

中观产业聚集区长时段的社会变迁。从方法论来看,《百年历程》使用的这种聚焦于单一产业、中观产业聚集区、长时段变迁的方法,可为学界研究同类区域提供借鉴。就笔者所知,在河北省境内,与高阳纺织区相类似的中观产业聚集区就有以安国县为中心的中药业聚集区和以辛集为中心的皮毛业聚集区。这两个区域都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近代以来也都经历了一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历程。<sup>③</sup>可惜迄今为止,这两个产业和中观产业聚集区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 二

经济学的发展史一直伴随着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论争。所谓经济自由主义,是指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机制,由“看不见的手”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只赋予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有限作用的经济思潮。相反的,国家干预主义则是一种主张削弱自由市场活动的范围,由政府干预甚至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较大程度上调配资源配置的经济思潮。<sup>[1]</sup>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个世纪经济变迁的具体过程,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种思潮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指导着各国政府具体经济政策的演变。

在高阳纺织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其发展最为顺畅也是较为充分的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结合这两个阶段的社会制度,前者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或者可称之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发展的有限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后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结合十三大以来中共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判断,则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仅从高阳纺织区地域之内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政府几乎均未对域内经济给予过任何实质性干预,所有的工、商企业都在市场上自行发展和自由竞争。只有高阳商会作为大部分工、商企业的自治组织,对保障域内纱、布市场的正常运转实施有限的调节。因此,前一阶段高阳纺织业的发展经验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契合。改革开放后,在高阳县域范围内,随着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县级政府逐渐退出直

接经营企业。同时,随着乡镇企业局职能的转变和被撤销,以及各级政府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扶持,政府对域内市场经济的干预也渐趋减少,并逐渐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尽管有时偶尔出现权力寻租的特殊情况,尽管高阳的民营企业存在“新官绅”与“新乡绅”的差别<sup>[2]</sup>318-320,但是它们对域内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影响极其有限。直至21世纪初,高阳数以万计的纺织企业在域内市场经济中总体上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因此,后一阶段高阳纺织业的高速发展仍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相契合。

总之,前、后两个阶段高阳纺织业的发展均主要得益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结合《百年历程》一书最后关于高阳纺织区的经济结构为“二元”结构以及经济的“二元”结构长期不变的论断,至少在高阳县域经济范围内,在处理政府与自由市场的关系上,仍应充分发挥市场和自由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应从制度和法治上为自由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 三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吴承明先生就撰文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吴先生指出“机船矿路”路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与中国传统经济脱节,不能发挥经济效益。进而他将张謇缔造的南通模式总结为“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的乡土经济发展路线”,并认为南通模式“不失为中国式的近代化的途径之一。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以至对立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景”<sup>[3]</sup>。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两大类课题:第一大类课题是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第二大类课题是中国近代经济中的关系问题,包括机器大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关系和城乡经济关系。

对于第一大类课题,吴先生的观点发表后,后辈学者参照结构主义的方法,提出过“近代三元结构论”、“半工业化”等新理论<sup>④</sup>,但这些理论对发展模式探究不多。《百年历程》一书的作者冯小红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阳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一种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模式,即“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动力,面向

市场的区域专业化乡村工业化模式”<sup>[4]</sup>。虽然冯氏在该文中没有提及吴先生总结的南通模式,但是从其表述方式上看,冯氏对高阳模式的总结应该参照了吴承明先生的观点,应该是对吴先生“南通模式”的一种回应。“南通模式”和“高阳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途径,二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差别。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机器大工业与乡村手工业协同发展,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域内经济的封闭和开放。南通的情形是张謇缔造的大生纺织集团以机纱的产品形态楔入本地的棉业经济中,使得机纱产前产后的植棉业和家庭手织业得到一定发展,形成了植棉、机纺、手织三位一体的封闭的产业链条。<sup>[5]</sup>66在这个链条中,大生集团的纺纱业单向依赖域内的手织业,因而这条产业链能否维持的关键在于手织业所产土布的销路。如果土布销售畅旺,乡村手织业发达,纱厂就会跟着兴旺;反之,如果土布滞销,乡村手织业衰落,纱厂就会跟着衰落。而南通的棉织业一直处于传统手工业范畴,其产品仍为传统的窄面土布。1922年之后,当南通产关庄布在东北销售呈现出下降趋势后,大生纱厂所产棉纱在域内销售不畅,不得不谋求外销,其营业便渐渐衰落,仅1922年当年大生两纱厂就分别亏损近40万两和31万余两。<sup>[5]</sup>65此后,大生集团一直靠借贷度日,直到1925年最终被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等债权人联合成立的机构全面接管。高阳的情形是集中发展棉织业,且引进铁轮机和机纱,生产改良土布。高阳棉织业所用机纱来自于国内天津、上海、青岛、榆次、唐山等地纱厂,所用人造丝完全由国外制造,主要由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制造,由上海、天津、青岛等处入口。<sup>[6]</sup>196-199因此,高阳纺织区是以制造业的形式参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纺织工业分工,从而能够长久地保持周期性繁荣。比较而言,高阳模式更加符合自由市场和开放竞争的世界经济潮流,因而比之南通模式更有竞争力,发展潜力更加雄厚,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对于第二大类课题中的“机器大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的关系”问题,学界以往的研究较为充分,兹不重述。<sup>⑤</sup>另一个“城乡经济关系”问题,以往学界亦有一定研究<sup>⑥</sup>,但是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以港口和城市经济为中心展开,广大乡村只是作为港口和城市腹地的角色。在这里,笔者结合《百年历程》一书对高阳



纺织业的精细研究,以高阳纺织业和高阳纺织区为中心,重新梳理一下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

仅从高阳纺织区的情况来看,乡村工业区主要以工业的前联和商业的后联两种形式与城市建立联系。工业的前联主要是乡村工业利用城市的机器制造业为自身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利用城市的大机器工业为自身制造生产原料。清末民初,高阳纺织业的铁轮机最早由天津引进,后来大都由本地仿造;织造麻布所用提花机也是由天津引进的。<sup>[7]15-16</sup>铁轮机的织造技术是由杨木森从天津延聘工师至蚨丰工厂传授而来<sup>[8]</sup>,提花机的织造技术是民国初年由北沙窝村苏秉衡从天津习艺所学习而来<sup>[7]16</sup>。改革开放后,高阳织造毛巾的主要设备1511型和1515-75型织机主要由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等城市的纺织机械厂制造,其“三巾”织造技术主要由县城毛巾厂传授而来。<sup>[9]77-78</sup>总之,工业的前联是城市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原料下行至乡村工业区的过程。商业的后联主要是乡村工业将自身生产的产品运往城市,利用城市的交通和市场网络,将产品销售出去。20世纪30年代初,高阳的布线商号利用自己的外庄将产品发往北平、太原、开封、洛阳、济南、济宁、烟台、包头、绥远、库伦、张家口、多伦、长沙、重庆、成都、福州、厦门、徐州、上海、汉口、沙市、兰州、西安、汉中、哈密、哈尔滨、奉天、长春、南昌、广州、贵阳等79个城市,并通过这些城市的市场网络发往各地的广大乡镇。<sup>[6]231-232</sup>改革开放后,高阳的“在外摆摊者”将本地产“三巾”产品发往全国各大城市以及各地区的批发市场,全国各地著名的批发市场,如石家庄的南三条市场、武汉汉正街、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沈阳的五爱市场等等,都有高阳“在外摆摊者”的身影。总之,商业的后联是乡村工业的产品上行至城市,再利用城市的市场网络下行至城乡用户的过程。

#### 四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就是经济现代化历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过程,现代化的工商业比之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在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变革是其最主要的旋律。然而这种变革并非完全的断裂,

而是在断裂之中有继承,传统商业管理制度中的部分精华仍被现代工商业改头换面地继承下来。《百年历程》一书虽未言明,但通过其分散于不同章节字里行间的描述可以看出,传统工商业管理制度中的合伙制在高阳纺织业现代化过程中就有所继承和发展。

据刘秋根研究,明清工商业中的合伙制有三种类型:资本与资本的合作、资本与劳动的合作、混合型合作(属于资本与劳动的合作,但是经营者也出一部分资本)。<sup>[10]186-244</sup>这三种类型的合伙制在高阳纺织业现代化的历程中均被继承下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高阳纺织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布线庄就存在前两类合伙制。在资本组织形式上,布线庄就有资本与资本之间合作的合伙制模式,如高阳纺织区第二大布线庄汇昌号,就是由担任过蚨丰号的二三号掌柜或外庄掌柜的韩惠丰、常翊华、孔蕴章、李竹庵、刘小文、孔长乐、李书明等7人各出资3000元合资开办的。<sup>[7]96</sup>在人事管理方面,高阳纺织区的布线庄普遍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合作的典型合伙制模式——股俸制,并在股俸制的基础上发展成股俸加工资的模式。<sup>[2]220</sup>改革开放初期,在高阳纺织企业中普遍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就是由多家出资并共同经营管理企业的一种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兼有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作和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合作,即兼有资本与劳动的双重合伙制。直至今日,高阳城西辛留佐村的大部分纺纱厂仍采用股份合作制的组织模式,各厂都有三、四个乃至八、九个股份,每个股份又有明股和暗股之分,明股是出面顶股并在工厂工作的股东,暗股是只投资于某个明股而不参与工厂经营管理的股东。如某棉纺厂1个股应出资30万元,A君出资15万元,B、C、D君分别出资6万元、4万元、5万元,四人合组1个股,由出资最多的A君出面顶股,在厂里任职。厂里只给A君一人开工资,年终分红时也只由A君出面参与,A君分得红利后,再私下里与B、C、D君细分。在这个例子中,A君就是明股,B、C、D三君都是暗股。股份合作制这种新型合伙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途径。仅就辛留佐村的纺纱厂来看,21世纪初该村有20余家纱厂,各纱厂明股、暗股合计将近100家参股,在经营形势较好的年份,每个参股的家庭都有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红利收入,致使该村近四分之一的家庭都较为富裕。<sup>⑦</sup>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上百年历程中,

乡村工业和乡村工业聚集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像高阳纺织区一样的乡村工业聚集区,如本文提到的以安国县为中心的中药业聚集区、以辛集为中心的皮毛业聚集区和山东潍县纺织区等等,多数未得到深入研究。笔者根据《百年历程》一书的记述,总结出一种聚焦于单一产业、中观产业聚集区、长时段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历程中的城乡经济关系以及对传统工商业管理制度中精华部分的发展性继承等理论问题。上述方法论和理论问题都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愿笔者的粗浅认识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这些理论问题在日后学界对其他乡村工业聚集区的研究中能够得到深入探讨。

#### 注释:

①“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第19页。

②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参见赵德馨:《市场化和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83页。

③这两个中观产业聚集区的基本状况分别见赵燊黄著、黄菊芬点校、章国镇审订:《祁州药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王登普:《辛集皮毛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④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⑥有关学界对机器大工业与乡村手工业之间的关系研

究见彭南生:《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第110—111页。

⑦仅以天津为中心的城乡关系研究就有: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张利民、周俊旗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吴松弟、樊如森等:《港口—腹地与北方经济的变迁(1840—1949)》,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

⑧见《高阳县辛留佐村纺纱厂调查笔记》,调查人:冯小红,调查时间:2012年7月—8月。

#### 参考文献:

[1]任丹丽.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论争中的立法[J].理论月刊,2006(5).

[2]冯小红.高阳纺织业发展百年历程与乡村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3]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2).

[4]冯小红.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4).

[5]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政协高阳县委员会.高阳织布业简史[M]//河北省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8]李秉熙.直隶高阳布业之沿革纪略[J].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9、10).

[9]王贤根.火红的阳光[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

[10]刘秋根.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张玉海)